

关于当前图书馆学研究之我见

赵世良

(黑龙江省图书馆)

《图书馆学通讯》自今年初开辟了“学术论评”专栏,并提倡“对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状况”“各抒己见”。面对这样的大题目,我实在胆怯得很;虽然也常想些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本来是不敢妄加评议的。那原因就是个人于研究一道荒疏过久,年轻时学的那一套也早已陈旧,而对近来国内外的图书馆事业实践和图书馆学研究状况又都若明若暗地知之甚浅。近读彭修义^①、邱昶黄昕^②、和况能富、吴棠^③等人的文章,对个人思想触动较大,似有不能已于言者;因而鼓起勇气略陈己见,并愿以此就教于海内同好。需要声明的是,这里所能谈的不过是一些极其初步的设想,自知很不成熟,而且缺乏切实的论据,实在过于草率,这是要请大家谅解的。

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世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受社会生产、文化、科学与政治方面的影响和制约。无论古代的藏书活动和现代的图书馆事业,都是应当时社会对文献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不能设想一个经济落后、文盲充斥、科学荒芜而且政治腐败的社会能有发达的图书馆事业,因为这样的社会里根本不存在对文献的高度需求。反之,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普及、科学先进、政治开明的国家,其图书馆事业也必然有相

应的规模,因为这里社会对文献肯定有所需求。既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以社会对文献的客观需求为依据,那么少数人的认识与决策就不可能对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当我们对不同国度的图书馆事业进行比较时,倘使仅只孤立地着眼于他们各自的图书馆事业本身去考查其先进或落后,虽然所据都是事实,但结论却难免是片面的。如再用以决定目标、指导实践,则必然不能取得理想的成果;因为国情不同,一家的先进措施未必到处都能适用。所以,尽管他人的成败都可借鉴,然而为搞好本国的事业,还是必须从本身的实际社会情况出发。任何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努力,其效果均不可能超越具体历史条件所赋予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必须结合存在的广泛社会背景来分析。

二、图书馆学的研究

随着图书馆事业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形成了独立的图书馆学科。图书馆学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这包括纵横两个方面。横的发展指研究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从版本校勘,图书采访、分类编目、藏书组织、到读者工作这样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纵的发展指研究深度,如藏书建设方面由排架而布局、由应用而剔除、由结构而模式;又如读者工作方面,由借阅制度到阅读指导、由参考工作到情报服务等就是诸如此类的不断深化过程。至于在研究方法上,也像其它学科一样,经

历了一个从现象描述到理论归纳的过程,并已开始了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过渡的努力。

然而,与其它学科相比较,我国当代图书馆学又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多数学科如生物学、化学等,在与各国并无重大区分;而医学则不仅有中医、西医,在我国国内也还有蒙医和藏医。像后者一样,当代主要国家的图书馆学研究均有自己的国度特色,而这些特色则无疑是由他们各自的图书馆事业状况与种种社会条件形成的。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前述那些条件对各国图书馆学的研究都具有强大的制约或促进作用。这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表现物质生产活动水平的社会经济条件当然是最基本的,而与此相应的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也是强有力的制约条件。至于政治条件,当然也往往具有非常强大的直接影响。

三、对当前进展的认识

这里只谈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从本世纪初公共图书馆在我国出现以来,在四分之三世纪里,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走过了曲折起伏的道路;而其节奏则与我国在本世纪内的历史进程是完全一致的。每当国内形势稳定、革命健康发展的时期,图书馆学的研究就总能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如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浩劫期间,图书馆学的研究就不得不完全陷于停顿。

自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稳步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征途,正在努力克服“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滞后效应。随着整顿工作的步伐,各行各业都相继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成果。在国内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的形势。全国举办了十几个专业科系,出版着几十种交流刊物,各级学会组织了近百次群众性学术活动,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完成的研究论文数以千计。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历尽劫波兄弟在”。若干老一辈图书

馆学家还在各地坚持着研究工作,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代中年图书馆工作者是这支研究队伍的骨干力量,一批在建国前后出生的本专业大学和研究班毕业生更以崭新的姿态走进了研究工作领域。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对这样一支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至于当前研究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随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逐步发展,和国际性学术交流的不断加强,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必将取得重大的突破。

四、几个关键性问题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必须大力克服重重的阻力,为推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迅速地、健康地、并卓有成效地前进,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必须解决。

一个是组织问题。不同于多数学科的是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至今还没有专设的研究机构与人员,也没有全国性的规划和人力与资金的保证。广大有志于研究的人们实质上是以业余爱好为基础而分散地、自发地来从事这种艰苦劳动的。尽管他们为此克服了无数难以想像的困难,然而受个人可能性条件的限制,往往不易迅速取得重大的成果。形成这种状态的另一个原因是有关各级领导人员对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特别是在基层机构,相当一批负责干部受自身政治、文化、科学与业务素养的局限而无力在实质上理解这一问题的迫切性。这也属于组织问题。

另一个是调研问题。目前如为了解国外某地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而搜集些文献,有时倒不很难;但对国内各系统图书馆的建设与活动,反而缺乏全面系统而又及时的调查材料。这一点对认真开展深刻的图书馆学研究妨碍至鉅,而又是远非个体的研究者所能解决的问题。为此建议有关当局立即着手准备尽快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图书馆事业普查。

还有一个是借鉴外国图书馆学研究成果

的问题。近二十多年来,东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近来国内虽不时有所介绍,但还谈不上系统的研究,难以认真吸取其精华而为我所用。这也是一项全国性的工作,应该迅速组织力量开展起来,并力争在两三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

五、我们应持的态度

我国目前的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状况,也包括图书馆专业教育的水平,诚然都是极不令人满意的。然而这一情况的出现自有其客观的、历史的原因,绝非是由于图书馆界某些个人或集体的失误所致。所以我们正该高瞻远瞩、携手共进,切不可妄自菲薄,更不必信口指责,以至引喻失义,真是所为何来!

至于对我们自身的缺陷等问题,当然要进行切实的剖析与研究。在这方面除须以充分的论据来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外,更需采取置身事内的态度,并要落实到具体的措施与建议之上,方不至失去目的。诸如泛指教师为“误人子弟”,或者看了一篇说我们“有些研究者”“风气之劣”的文章就宣称

“有希望了”等等。其实风气岂能由少数人形成?而所谓“误人子弟”的原因又在哪里?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倒是种种过甚其辞,却实在很难对实现咱们的希望有所助益。

发展祖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这里当然包括在某些方面有缺点甚至有错误的人,其实这种人可能还为数不少。此外,还要包括那些有时说过头话或时常说过头话的人。泱泱大国,些许小事,何足为奇!我想只要大家都怀着为发展祖国图书馆学而献身的愿望,就一定能够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相互学习、相互鼓励,而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兴旺发达也自然就是指日可待的了。

参 考 文 献

- 〔1〕彭修义 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 《图书馆学通讯》1981, 3, 85—88
- 〔2〕邱昶、黄昕 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学通讯》1982, 1, 31—39
- 〔3〕况能富、吴棠 关于《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一文的来信(选登) 《图书馆学通讯》1982: 2, 63—64

(上接第56页)

而且广泛涉猎了达尔文和赫胥黎等人的著作,注意考察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回国后,非常热心教育和翻译出版事业,他所翻译的《天演论》,打动了那些主张发展近代科学文化的知识界代表人物的心弦,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代表资产阶级文化而有学术价值的译著”。当时小学教员往往以此作课本,中学教师则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做作文题目。鲁迅先生更是爱不释手,“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 俚 饼、花生

米、辣椒,看《天演论》”。严复还十分重视留学教育,要求学生出洋之前务必学好西方的文字、语言,为沟通我国近代国外科学教育交流进一步作出了贡献。

从上看出,图书情报工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只因后来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推行封建锁国政策,致使图书情报工作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柱,停滞不前。今天,我们如能深入挖掘,加以总结,必将有助于现有图书情报事业的不断发展。